

对“中国经济圈”各种议论的评述

赵文骧

在亚太区域、次区域合作模式的探讨中，“中国经济圈”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有各种有关“中国经济圈”的构想和议论，其名称不一，实际内涵也有差别。各种构想和议论反映了不同人士的立场和倾向，体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要求。现就各种议论的要点及背景逐一加以评述，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香港学者最早提出的看法

1980年香港21世纪学会会长黄枝连在《美国203年：对“美国体系”的历史学与未来学的分析》一书中，率先提出“中国人共同体”的概念。黄枝连根据中国实行开放政策，香港将回归祖国，两岸关系开始松动等事实，提出“在80年代和90年代里，亚太地区发展的一个特点，将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跟非社会主义部分趋向于交流合作。”

“80年代后期，在亚太地区会出现一个‘中国人共同体’……这个‘中国人共同体’与‘美日混同体’的关系将是十分密切的。”

事隔多年后，到1987年5月黄枝连又旧话重提，但改用“中华经济系统”的提法，其概念的内涵却仍指大陆、台、港、澳的经济合作。^①

1987年10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坤耀也开始提出“中国圈”的看法。他明确指出：“‘中国圈’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所组成。它是同一个族，将为世界经济成长的四大支柱之一。中国圈的概念完全没有政治性，十年八年内会有一个完全的统一”。

并说“中国经济圈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但三个地方都是同一民族，它是经济比较优势的一种自然组合。这样一个经济力量，正在不知不觉间逐渐形成；而随着政治的日益开放，更将加速经济圈的壮大，最终也加速了中国的统一”。

显然，最早提出“中国经济圈”一类看法的两位香港知名学者，只是客观地描述了两岸三地关系的新变动，指出可能出现某种结合的新趋势，并在世界经济及亚太经济总格局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圈”出现的重大影响。他们的本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先声夺人”，争当先知先觉者。不过，黄枝连教授在日后对“中国经济圈”的鼓吹仍努力倍加，并提出不少新的想法，希望以此促进海峡两岸的合作。

二 具有台湾背景学者的构想

到了1988、1989两年，参与“中国经济圈”议论的人数激增，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闵建蜀、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高级讲师郑赤琰，还有饶美菱、周大中等人都参加了议论队伍。而在此期间，两个具有台湾背景的美籍学者的议论最为引人注目。一是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博尔大学教授郑竹园，二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台湾《天下》与《远见》杂志社社长高希均。

郑竹园提出了“大中华共同市场”的构想，并指出“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对峙近40年之后，应该以西欧国家为范例，寻求共存共荣的途径。在现阶段政治及经济制

度互异的情势下,全面性的统一不可能达成,唯一可行的道路是成立一大中华共同体,或称共同市场。”郑氏认为,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共同市场应以中国为主体,包括台湾、大陆、香港及新加坡。在开始时,大体上仿照欧洲共同市场之体制,包括下列几项原则:

(一)各成员维持原有政治经济体制不相统属;

(二)共同市场现阶段之功能,在求经济上的互相合作,不求政治上的统一。政治统一将视为未来目标;

(三)共同市场总部可设在香港或新加坡。每年年会轮流在台北、北京、香港及新加坡举行;

(四)共同市场对成员减少贸易限制,提供优惠贷款,但不包括资金与劳力的直接交流;

(五)成员有自由退出权利……。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高希均则发起了建立“亚洲华人共同市场”的探讨。高氏认为“当前的中国大陆,因其地大物博,10亿5千万人口及庞大的军事力量,得到国际重视,但因所得太低,得不到尊敬;相对而言台湾、新加坡、香港,因它们的经济奇迹得到国际尊敬,但因地域小而得不到重视。”高氏在回顾国际经济形势及区域集团化趋势后指出:“面对这种区域性经济结盟的兴起与蔓延,面对世界市场这样的瓜分与保护,分布在亚洲国家与地区的10亿多华人如何自处?仍然坚持政治体制的不同,个别发展,受制于美、日等国?或者‘让政治归政治’,设法形成经济合作,凝成前所未有的华人力量,为中华民族争世界一席之地?做为一个中国人,尤其作为要对历史负责、对后代子孙负责的中国政治家们,还有什么课题比这个更重要?”^③

从上述言论看,郑竹园及高希均两位美籍学者所持的看法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他们都把“大中华”或“华人”等字眼放进构想名称中,合作地区除大陆、台、港、澳外,还包括新加坡,甚至涵盖世界其他华人聚居地区。对此,黄枝连曾在自己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不能把新加坡共和国“相提并论”。^④

(二)郑、高两人言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企望海峡两岸捐弃前嫌,实现统一,凝聚华人力量,振兴中华民族。为此,黄枝连称他们是“具有热爱中华豪情和深刻洞察力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学者。”^⑤

(二)两位学者对海峡两岸长期对峙的过程及症结所在了解颇深,基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设计了一套照顾台湾当局利益和情绪,并能“进退自如”的合作方案。在他们的构想中纳入新加坡或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地区并非偶然,这是为了冲淡“一国两制”的设计架构。因此,尽管他们提出构想的主观愿望是为了促进两岸统一,但客观上是否有利于统一,尚属疑问。

三 台湾当局所持态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89年的议论高潮中,台湾本岛学者参与其事的为数甚少。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于宗长先生仅表示,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时间尚未成熟。^⑥台湾当局对“中国经济圈”的议论亦甚少说辞,1993年12月中旬参加“亚太地区与汕头特区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史惠慈也曾说,“台湾政府并没有提倡‘中国经济圈’。”

与学者及官方的冷漠态度相反,台湾的工商界人士却有不少人参与议论。80年代末有大众电脑公司董事长简明仁、南亚塑料公司经理王文洋(王永庆之子)等人;当前还有世华联合商业银行营业部经理曾庆辉等。台湾工商界人士的议论主要强调两岸各种资源的互补性甚强,需要加强交流合作,并希望避开政治死结,实现“中国统一”,甚至

世界华人的大联合。

那么台湾当局为何不提倡“中国经济圈”之类的构想呢?据各方面的反映来看,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就包括大陆、台、港、澳地区的“中国经济圈”设想而言,台湾当局担心,这是“以经济促政治,以经贸促统一”的统战策略的一部分。曾任台湾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萧昌乐曾直截了当地指责“大中国经济圈”是“一个政治上的圈套,意在制造台湾工商界与政府对立,打破台湾的三不政策,遂行其三通,进而迫我和谈”。^①

(二)对于“大中华共同市场”一类的设想,台湾内部也颇多疑虑,因为尽管学者们处心积虑地企图避开政治纠葛,谋求共同发展,并且把新加坡及其他华人聚居地区也纳入圈内,但一旦加入“大中华共同市场”,便有一个主导权的问题,而以各方面的条件考察,主导地位非大陆地区莫属。

(三)“大中华共同市场”提出还会使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为难,并惹恼东南亚各国政府。本已十分复杂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处境问题会显得更加复杂,并会使潜在的“中国威胁论”又重新抬头。

(四)日本、韩国对成立华人共同体或中国经济圈一类的经合组织,可能会加以抵制和抗争,就连欧美国家也可能采取强烈的经贸对峙行动。^②

台湾当局尽管不提倡“中国经济圈”之类的构想,但十分重视我对“中国经济圈”问题的看法。最近台湾又有意提倡“南中国海经济圈”。诚然,“南中国经济圈”构想容易因应台湾当前在对外经贸政策中的“南向政策”,因为台湾官方目前所定的对外投资重点是越南(西贡)、菲律宾(苏比克湾)和印尼(巴淡岛)。1994年7月菲律宾贸工部前部长阿尔坎塔拉对记者说,马尼拉与台北经济官员在马尼拉会晤时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包括菲、台、港、中国南部沿海的经济

开发区。双方将继续会谈,以商议该项计划的具体细节。这或许便是实行“南中国海经济圈”计划的试探性步骤。台湾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最担心的是由日本主导或中国大陆主导。因此台湾最有可能参加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是马来西亚发起的东亚经济会议(EAEC)或者在已经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改变地区性成员的身份。这两个组织,前一个很可能由东盟国家主导,而后一个美国正在争取主导地位。

四 东南亚国家的态度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圈”一类的提法,一直相当关注。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瓦南迪曾经就此发表过激烈的言词,他说:“大中华(Greater China),和‘海外华人网络(Overseas Chinese Network)’等概念现在已讲得很多。这是中国所面对的另一类敏感问题。‘大中华’(或大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这已经不单是一个构想,而是一种经济现实。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地区内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大动机,仅仅如此而已。

‘海外华侨’这是一个更为敏感的问题。有一点非常重要,必须记住,即中国血统的东南亚人植根于各自的人籍国,作为当地国家的公民,他们过去曾经现在仍在扮演着积极的正面角色。

在东南亚,‘华侨’一词已是一个不甚确当的字眼,今日的东南亚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华侨’。当前的华人经济之所以颇具活力,主要是受益于入籍国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及西方和日本的资本、技术转移,与中国并无关系。过分夸大华人经济的作用,尤其是追求华人首先效忠中国,这不利东南亚民族融合的进步过程,而只会勾起已往有过的华族是‘第五纵队’的担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在1950—1970年间有过烫手的经验,现

在应该会聪明地避免重犯错误。所幸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似乎已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出言不慎或者采取不恰当的政策会带来的破坏性。实际上,东南亚国家一直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过程。”^⑨

1993年11月在香港举行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的前夕,约瑟夫·瓦南迪还告诫与会者,讲话不要激烈,以免向东南亚国家传递错误信息。结果闹得印尼华商不敢公开赴会。

鉴于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重要地位,可以把约瑟夫·瓦南迪视为印尼政府的代言人,其所发表的言论是相当有份量的。而实际上,在东南亚国家中,当前印尼的华人问题确实最为敏感,反华情绪的一触即发之势,系为印尼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所使然。

李光耀作为东南亚民族独立国家的第一代领袖人物,自然深知东南亚华人问题的敏感与微妙,他在受邀出席华商大会并致词时,首先指出华人网络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性,并呼吁加强这一网络,使其更为有效。他说:“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有益的联系。……估计在十年内将有大批的华族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散布在(世界)各大城市,……经济网络的联系有着相当大的潜能”。“要使网络联系有效地运作,就必须加强它的系统化。我们可以编制指南,列出姓名、个人简历、商业背景,使任何人在需要适当的接触人或伙伴时,都可以立刻获得参考资料。这类指南也应该提供价格和信贷担保的资料,包括个人的银行担保。如果这些资料能储存在资料库内,并且能够通过国际网络(Internet)或大学网络(Bitnet)来取得,那就更加理想。”

他并申辩说:“网络联系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大家大可不必为了要通过互通信息以争取最大利益的机会耿耿于怀。其实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么做,犹太人这么做,印度教

徒和回教徒也都这么做”。他在谈到“今后10至2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东亚经济会比世界其他地区增长得更快,而中国将是它的动力源泉”后,指出“如果新加坡企业家不参与这个时代的最大变化,不参与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队伍,那将是一项错误的决定。如果我们不利用华族网络扩大和掌握这些机会,那将是很愚蠢的。”

但是李光耀也直言不讳地承认华人问题是“东南亚的敏感问题”,“任何东盟国家与中国交恶,这个国家的华人在中国投资,不免有对本国不忠之嫌”。为了缓解各种矛盾,并达到避嫌的目的,他强调了一下各点:

1. “我们必须心悦诚服地认清,我们最终的效忠对象,应该是入籍国而不是祖籍国这项事实。……我们已经在出生地落地生根。我们同本国,而不是同中国或祖籍国利益攸关。”

2. “来自这些‘敏感’国家的华人,不能因为在中国投资而减少了在本国的投资。”

3. “他们最好也利用自己同中国的‘关系’,来促进中国和他们本国的贸易,同时,也增加中国在他们本国的投资。”

4. “海外华人在成功的时候,必须谨防华人沙文主义,正当中国繁荣兴盛时,这一点显得更加重要。”^⑩

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的华族占多数的国家,过去对于中国和华人问题,都是采取迴避态度。但是后来新加坡领导人发现,越是采取上述态度,周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马来人种占多数的国家便越是挑剔。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中国的逐渐开放和强大,李光耀从80年代后期起便采取“反守为攻”的策略,即在公开场合阐述在东南亚建立民族和谐和多元文化社会的立场,在国内他也公开宣扬传统儒家文化、推广普通话和汉字简化字。当然,李光耀对于新加坡国内为数

较少的马来人、印度人及白人等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24%)的利益仍相当关照,在民族平等的旗帜下,实际上采取的是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在香港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他也声称,除了欢迎其他国家的华族专业人士及商人到新定居外,也欢迎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的专业人士及商人到新定居,以利用这些专业人士扩大与世界回教社群和印度属群人士的联系。

约瑟夫·瓦南迪和李光耀,尽管因为他们代表的国家及所在国家政策背景的不同,所发表的见解有很大差异,但是有一个观点是完全相同的,即“大中华”、“华人”及“华人网络”等问题都是东南亚的敏感问题,需要慎重对待。

五 日本方面的看法

日本学者参与“中国经济圈”问题的议论比较早,并且这种议论从8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至今。日本学者的议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学者,是亲华的华人学者,如日本国际大学教授游仲勋等;另一类学者持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以日本国家利益为发论的基本立场,如三井物产贸易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市川周等。

游仲勋议论的特点是:

(一)反复地论述中国经济、台港澳经济、东南亚华人经济,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经济的迅速发展,指出其相互联系的各种渠道和形式,并预言21世纪的亚太地区,华人经济将是主角。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海外华人希望祖国强大、民族振兴的普遍心态。

(二)从社会学及民族学的观点出发,坚持把中国大陆、台港澳、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华人的经济实力、资本数量作总量估算,并分析其所能发挥的作用。但在与大陆学者的不断交往过程中,他也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提法,如把“中国人”、“华侨”、“华人”等概念已分得很清楚,把“华人经

济圈”的提法也改为“华人经济网络”。

市川周的看法则代表日本国内另一种倾向。现在日本国内除了政府部门及大学所办的研究所外,各大财团对亚太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也十分活跃。大财团所属或者资助的研究单位,如三井物产贸易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等,不仅从事市场调研和投资环境评估,还对国际经济格局及政治格局的变化进行跟踪深入研究。

市川在1993年10月12日出版的日本《经济学人》周刊上,发表了《在亚洲太平洋的政治和经济争夺》的文章,文中提出的下述观点很值得重视。

(一)中国的“三个三角形战略”是:扩大“小三角”(大陆、香港、台湾)的相互依赖关系,加强“中三角”(中国、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东盟)的合作,周旋于“大三角”(中国、美国、日本)之间。

“三个三角形战略”把大华人经济圈提到战略地位上。东盟华人资本同“华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在东南亚及中国的活跃交流,10年后有可能形成从北京到雅加达的以华人为主体的大经济圈。

(二)有些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提倡东亚经济会议“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标榜不结盟主义的反美情绪”以及“伊斯兰文化本身对美国的价值观持怀疑态度”。另外还有一个“未公开的意图”,那就是让日本在东亚经济会议中起到同中国的抗衡作用,摧毁中国主导的三角形战略,实现“华人和非华人”的共处战略。

(三)日本作为西太平洋“非华人主权国家群体”的领导者要维持国家的活力,以便能对抗21世纪初将日益明显的中国在地区经济政治中的主导力,不使西太平洋地区成为“扩大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华人经济圈”的势力范围。

市川周的言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财阀及其政治代表的看法。他们害怕中

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妒嫉中国与台港澳及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企图以挑逗民族情绪的手法,拉拢东盟国家,抵御中国的影响,争取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与政治主导权。

六 美国、西欧等国的看法

美国人议论“中国经济圈”的时间比较迟,大约从90年代初才开始,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何汉理)的话说,即“中国经济圈”的概念是从香港和台湾“进口”的。从美国政界到学者现在通用的称法是“大中华”或者“大中国”,英文里叫“Greater China”。哈里·哈丁称,“大中华”的“大”字(great),诚然听起来有点刺耳,因为从历史上看,“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等国家是用武力所建立起来的帝国。但“大中华”这一提法,不象“经济圈”、“共同体”、“统一国家”那么具体,而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这样一种现实,即中国在经济、文化及政治等各方面的活动和影响已扩展到了原来的疆域以外,而且“大中华”这个称法比较简单易记,在美国可能还会继续沿用下去。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政府的智囊机构,对美国对外政策颇具影响。哈里·哈丁是一名后起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献言甚多。他认为,“大中华”客观上已经存在,香港与华南是其核心,台湾也已加入进来。如果“大中华”确已存在,那么是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起主导作用呢?他认为是经济互利因素起主导作用,文化因素及民族感情只起支持作用。

哈里·哈丁还提出了美国对“大中华”的发展最为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大中华”的范围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甚或包括哪些疆域?南中国海及外蒙古是否包括进去?

(二)“大中华”的统一是否会完全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统一后的政府将是一个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

(三)统一后的中国吸纳了各种资源是否会变成特大型的超级大国?

(四)如果事情是另一种情况,那么“大中华”是否有可能变为“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一类的“华人经济区”?倘若如此,将来的组织机构又会怎样?

(五)这个经济区是一个开放型的区域,还是一个排他性集团?这是美国工商界最为关心的问题。

(六)美国人担心会出现一个竞争性很强的经济集团,以致影响美国的经济。⑥

美国、西欧等国家的学者和报刊90年代初起,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渲染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经济及华人财团的崛起,以期引起政府部门对中国地位及中国市场的重视,影响政府的亚洲政策及对华政策。这种舆论热潮,一方面导致象哈里·哈丁那样的学者对中国问题及“中国经济圈”问题的认真深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西欧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但是另一方面,这股舆论热潮中还往往夹杂着对中国经济实力及海外华人经济实力的夸张评估。象英国《经济学人》等杂志是最积极地参与起哄的刊物,这些刊物把包括港、台等地在内的所谓“海外华人资产”评估,从3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一直提高到20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用“购买力评价”来估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把中国一举列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此外,还在“经济过热”、“环境污染”、“劳工条件”、“贫富差距和地区开发差距”等问题上大做文章。更有甚者,有一些西方人士还借此煽动“中国威胁论”,企图掀起反华逆流。

总之,美、欧国家的普遍心态是,既想挤进中国市场,又怕中国发展,既想打“经

济牌”，又不放弃“民主牌”。

七 一些看法

上面对各种有关“中国经济圈”的议论或反应作了简单的回顾及评价，这种评述带有“研究之研究”的性质，因为归类及择要叙述已是从已有立场出发，更不用说评价中的观点了。但是为了达到尽言的目的，还想集中表达一些笔者自己的看法。

80年代末，随着国际上有关“中国经济圈”一类议论兴起热潮，国内舆论（主要是学术界）也积极响应。后来，邓小平同志发表讲话后，国内议论减少，但最近两年有关方面又提出“中华经济协作体系”等构想，所及内容大致与80年代初雷同，即鼓吹促进海峡两岸四方（大陆、港、澳、台）的经济合作，并阐述四方经济的互补性合作潜力。但我们认为，现在仍不宜提倡“中国经济圈”一类的设想，其理由有如下三点：

1. “中国经济圈”一类的构想并不会促进两岸的经济合作

目前海峡两岸四方的经济合作主要是私人企业受市场力量的驱动，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而发展起来的。各地当局固然制订了相应的政策，以鼓励或者限制企业的活动，但并无相互间的政策协调，更无超地区的权威组织机构。在相互贸易、投资或其他形式的交往中所出现的纠纷是通过双边谈判未予以纾解的。这种状况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即使在“九七”和“九九”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之后，由于两地特别行政区的地位所决定，以及海峡两岸政治僵持局面的存在，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也就是说举起“中国经济圈”或者“中华经济协作体系”的旗帜，不可能把“市场主导型”的两岸四方合作转变为“政府主导型”的合作，不会导致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等组织的出现。宣扬“中华经济协作体系”只是起到了确认两岸四方经济合作现状的作用，并无进一步促

进这种合作的作用。如果把我国的长远发展计划建立在“中华经济协作体系”成立的基础上，那是更为危险的。

2. “中华经济协作体系”不可能是统一模式的雏型

我国实行“以经济促政治”的对台工作方针，主要用意在于发展两岸经济的互利合作，加深相互依赖，以有利于日后的政治统一。但是经济合作模式与政治统一模式是两回事，如果真是按照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模式实行经济合作，并发展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那么这种“政治统一”甚至比“联邦”、“邦联”的设想还要后退一步。

3. “中华经济协作体系”一类的构想不宜成为团结世界各地炎黄子孙的旗帜

如前所述，海峡两岸四方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系为市场主导，并非政府主导，更非民族感情与中华文化所主导，而且这种经济合作是融合在我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如果突出中华经济协作的作用，那么既无利于促进这种合作的发展，又会惹起美、日、欧及东南亚等国家的猜疑和抗衡。如果把范围牵扯到世界各地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那么对我国的睦邻外交将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也不利于东南亚华人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中华经济协作体系”将不可能成为团结世界炎黄子孙的旗帜，而只会导致相反的后果。

诚然，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两岸四方的经贸、投资关系渐趋紧密，东南亚华人财团随着所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日益壮大，并积极参与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关系，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历史发展过程考察，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往往孕育着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也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及经济格局的调整和重组。因此，世界各地对“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圈”问题普遍表示关注，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但是,参加类似“中国经济圈”问题议论的人士,其政治背景和立场观点各不相同,所提的构想也有很大差别,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因此,不管我们提不提倡“中国经济圈”一类的口号,我们对各类构想的具体细节,对各种议论的复杂背景仍需跟踪观察并加强研究。

此外,需要对各种议论和反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在外交场合和涉外交往中,需要耐心地听取不同背景人士有关“中国经济

圈”的意见,做好说服解释工作,尤其要注意不能伤害海外华人的爱国热诚。在宣传报导中,要加强舆论导向,不为国际舆论起哄热潮所左右,以致掉入“舆论陷阱”。对明显的反华言论,需要选择典型,澄清事实,或者加以正面驳斥。我们现在需要一方面反对国际反华势力的挤压,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大汉族沙文主义。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

注释:

- ① 黄枝连《“中国人地区”协作系统的探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89年2月。黄在此文中回顾了“中国经济圈”构想的发展过程。
- ② 文涌《亚太区经济前景和中国圈:访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坤耀教授》,香港《经济导报》,1987年11月30日。
- ③ 高希均《台湾应当分担国际责任》,台湾《远见》杂志1988年9月15日。
- ④⑤ 同注①。
- ⑥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12月19日10版专

题《提议建立“亚洲华人共同市场”》。

⑦⑧ 已月《台湾积极推动“大中华共同市场”?》香港《华人》月刊,1989年6月号。

⑨ 约瑟夫·瓦南迪《中国的亚洲籍》,台湾《远东经济评论》,1993年11月25日出版。

⑩ 李光耀《建立起有效的网络联系》,在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的讲话,新加坡《联合早报》1993年11月23日。

⑪ 哈里·哈丁(何汉理)1993年5月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东南亚华侨通史》出版

一部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集体撰著的《东南亚华侨通史》一书,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961页,71.4万字,插图45幅,统计表96份。共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编22章,系统地论述东南亚华侨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并阐明这些变化的规律性。对不同时期华侨的人口和职业构成、经济结构,对华侨农业、矿业、小商小贩、工人、企业家和华侨社团、华侨教育、华文报业、秘密

会社,以及历代政府对华侨的政策和态度,华侨对居住国和祖国的贡献等,均分别探讨其产生原因、发展因素、变化条件及其固有特点,并阐明华侨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全书资料翔实,采用了不少未发表的调查资料和档案材料。

该书由吴凤斌、林金枝、李国梁、庄国土、蔡仁龙等合著,吴凤斌负责主编、总纂与修订。(旭辉)